

朱熹易学 思想研究



张克宾 著

朱熹易学体大思精，将自伏羲画卦到汉唐直至当时的整个易学发展都吐纳于胸中，直指《易》之本然与太极阴阳之妙，掘微发幽，建构起充满理性精神和诠释学意识的易学体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




人民出版社

朱熹易学
思想研究



张克宾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方国根
责任编辑:方国根 段海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易学思想研究/张克宾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01-015200-4

I. ①朱… II. ①张… III. ①朱熹(1130~1200)-《周易》-思想评论
IV. ①B244.75②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1551 号

朱熹易学思想研究

ZHUXI YIXUE SIXIANG YANJIU

张克宾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数:32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5200-4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朱熹早年所受《易》教及其思想的转变	11
第一节 从学武夷三先生	12
一、谯定易学的影响	12
二、屏山的“不远复”之说	16
三、出入释老时的易学熏染	19
第二节 归本伊洛 学宗程《传》	22
一、延平的“理一分殊”之教	22
二、批驳《苏氏易解》	26
第二章 卜筮之书:《易经》文本的新探索	35
第一节 “《易》乃卜筮之书”的提出	36
一、“变古”求真的时代风潮	36
二、“《易》乃卜筮之书”的提出及其依据	39
第二节 “《易》乃卜筮之书”的新义涵	47
一、《易》以卜筮设教	47
二、辞因依于象	52
三、《易》如一个镜相似	58
四、必有是理而后有是辞	68
第三节 “卜筮之书”的读法	72
第三章 三圣分观:《周易》经传关系的新诠释	78
第一节 读《易》当分三等	78

一、伏羲易	80
二、文王易	81
三、孔子易	83
四、三圣《易》说的“理一分殊”式关系及其理论意义	88
第二节 《易传》对《易经》的多维度诠释	93
一、“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	94
二、“变例推明占筮之意”	97
三、推说象占之所以然	98
四、《易传》亦用羲、文本意	101
第三节 《周易本义》:朱熹注《易》的慧识与困顿	103
一、《周易本义》的成书与吕氏《古周易》	104
二、经传客观抑或传解经——《周易本义》的注解特色 与方法	112
第四章 河洛先天之学:理数之本然的象数化表诠	121
第一节 《易学启蒙》的创作与《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考	122
第二节 《河》、《洛》之蕴	139
一、“图书”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宋易象数学的发展	139
二、“图书”的考据学认定	146
三、“图书”的天地自然之义	152
第三节 先天之学	164
一、伏羲画卦之理序	166
二、先天圆图与方图	175
第五章 后天之学与占筮之术:气数之变化的象数化体究	190
第一节 后天之学	190
一、文王八卦次序	190
二、文王八卦方位	193
三、基于先天学的卦变说	202
第二节 占筮之术	213
一、“大衍之数”章疏义	216

二、朱熹“大衍筮法”中的两个关键问题	226
三、有理而无用的变占说	234
第六章 太极生生之妙:天道性命贯通下《易》与理的融释	240
第一节 太极之妙	241
一、朱熹与《太极图》及道统	241
二、无极而太极	251
三、动静阴阳	256
四、继善成性	260
第二节 《乾》、《坤》之义	267
一、乾坤只是健顺之理	267
二、元亨利贞	271
三、健顺工夫	279
第三节 生生之德	285
一、复见天地之心	286
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295
结 语	303
参考文献	310
索 引	315
后 记	325

导 论

《周易》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最为独特的典籍,说它独特,一方面在于它独具的象数型意义表达方式,一方面在于它所体现的究极天人的宏大学术品格。其学肇基于占筮之术,而又囊括天人之道。占筮作为先民把握和认知世界的方式,最初具有浓厚的原始文化的巫卜特征,但随着历史文化的演进其内涵也在不断转进,摄取新的哲学文化因素。帛书《要》篇中孔子论卜筮与《易》说:“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①巫之《易》只是幽赞于神明而占筮,并未能把握其中的数理亦即占筮之所以然;史之《易》则明晓了占筮之数理,但却未能体察到其中的德义内涵。只有到了孔子那里卜筮与《易》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孔子创造性地诠释了其中蕴含的天人价值内涵。“赞”、“数”、“德”三者层层递嬗,是一个连续性的意义生成过程。

从哲学的视野来看,占筮活动建立在人与天地万物相感通的基础上,著草及其运算只是这一感通得以实现的手段。如果没有人与天地万物的感通,占筮活动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根底,失去了它得以存在的“合法性”。虽然在今天科学理性的视野下,占筮活动被看作自我迷惘的游戏,但在古人那里,它的神圣性,它所具有的实现天地人物一体相通的功能是不容置疑的。这种人与天地万物的一体相通,体现出占筮活动所蕴具的终极境域。在这一终极境域中,天、地、人、物融为一体,过去、现在、未来融为一体,整个的时空都汇于当

^① 廖名春:《帛书〈要〉释文》,《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89页。

下,通达无碍。析而论之,占筮活动既关涉到占问的主体——人,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都是进行占断需要考虑的因素;又关涉到占问的事项及其情境——天地万物,整个外在世界的动态流转就是进行占断的宏大背景。前者所体现的是一种人生观照,后者所体现的则是一种宇宙观照。所以说,在占筮活动中,已经潜含着终极性的人生关怀和宇宙关切,只是二者依托于万物有灵论,遮蔽在原始思维的帷幕下,混融一体,晦而未彰。在人类文明的理性化历史进程中,二者才得以逐步展现。此一展现,初步体现于《周易》古经,继而彰显于先秦《易传》类作品,特别是后者将人文价值理性贯注其中,对占筮活动和《周易》古经的意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转换。《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段话正是对卜筮与《易》演进过程的统合性论说,将巫史文化和儒家义理整合为一体。到了《易传》那里,卜筮所体现的原发的天人之思终于开显为天道与人事、自然与价值相贯通的天人之学。不唯如此,更为独特的是,此套天人之学以其独有的“象语言”(包括卦爻符号和卦爻辞)为其意义表达方式,“象语言”的含蓄性、模糊性、开放性及时遇性给人以无穷的启发,也使《周易》文本具有了广阔的意义涵摄力,使得诸家学说都可以借之得以发挥和阐释。于是,在历史的发展中,易学形成了“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学术特色。^① 概括地说,《周易》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大致可以归于三个方面:一是它扎根于远古文明,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原发之思,也从而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源泉;二是在《易传》的创造性诠释下,《周易》实现了由卜筮之书到天人之学的转变和提升,开显出以阴阳思想为核心的天、地、人三才一体融通的天人之学;三是《周易》独具的“象语言”的言说方式,不落方体,上可以推究于形上之域,下可以照察于人事之用,具有极强的意义涵摄力和理论吸引力,使之具有诠释和吸纳新的哲学文化的功能。这也就是易学能够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无论是汉唐经学、魏晋玄学还是宋明理学,都

^①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云:“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页)

以《易》为其基础性理论资源,其核心问题和思维模式都通过《易》而得以阐释和证成。冯友兰先生曾说:一部《周易》就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现象学。^① 这是非常正确的。

西汉以降,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经典研究成了学术的重心,以“五经”为载体的礼乐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与《诗》、《书》、《礼》、《春秋》诸经专注于思想文化的某一具体方面不同,《易》则由天道而推及人事,表达的乃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整体性哲学观念,是经学“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的理论支撑,也从而成为其他经典的理论基础,被视作“五经”之首。受当时以天人感应论为理论基础的经学思潮的影响,汉代易学发展出以“卦气说”为核心的象数学系统。^② 这一象数学系统以卦爻符号为表达形式,以阴阳五行思想学说为内涵,所蕴示的乃是天人一体互动的整体之学,其中既有天地万物动态流转、生生不息的总体宇宙图景,也有君臣父子、家国天下各得其宜、尊卑有序的人文价值理想,在继承先秦易学基本精神的同时又发展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理论内涵。^③ 但是,汉易象数学由于过分推重于象数化的意义表达方式,在解释《周易》经传时更是极力寻求其中的象数根由,使得其象数系统越来越复杂、烦琐,加之象数本身在意义表达上带有含蓄性,没有文字表达更直接,于是极端烦琐的象数形式转而成易学意义表达的障碍,势必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文化的要求。随着崇尚自然与自由的魏晋玄学的兴起,汉易象数学的时代也就终结了,出现了以王弼为代表的新的治《易》路数。

王弼承接《易传》所开显的解经义例,对《易》学“象语言”的结构、功能和哲学意义作出了不同于汉易象数学的新诠释,提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全书绪论”第12页。

② 参见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附录一《汉代易学》,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页。

③ 关于汉易象数学的哲学文化内涵的研究,可参见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附录一《汉代易学》,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489页;王新春《哲学视野下的汉易卦气说》(《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哲学视野下的京房八宫易学》(《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郑玄爻辰说的哲学文化底蕴》(《周易研究》2008年第6期)、《荀爽乾升坤降说的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切》(《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虞翻易学旁通说的哲理内涵》(《哲学研究》2001年第9期)、《虞翻易学“成既济定说”的哲学文化底蕴》(《哲学研究》2009年第6期);林忠军《〈易纬〉宇宙观与汉代儒道合流趋向》(《哲学研究》2002年第10期)。

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①，由汉易以象数为治《易》之本，转变为以义理为治《易》之本，确立起中国易学史上的义理派。实际上，汉易象数学并非不重义理，象数学家们之所以潜心于易学象数学的创造，根本原因正在于这套象数学系统能够很好地表达他们所追求的天人宇宙图景和人文价值理想，而且汉易象数学在两汉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哲学文化功能。但是，汉易象数学的烦琐化发展最终使其形式义湮没了其义理内涵，背离了其理论的初衷，与此同时，其原本所具有的哲学文化功能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失去了原有的作用，这些因素使得汉易象数学在汉魏之际由内到外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而王弼易学则是适逢其时，将象数恢复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上》）的本位上来，建立起以有无为基本范畴、儒道兼综的义理学系统，成为当时玄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黄宗羲有段著名的评论：“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②王弼易学以其革命性的变革“独冠古今”^③，唐初编订五经正义，《周易正义》取王弼、韩康伯注本，“于是自唐至宋，王弼注本成了官方取士的标准本。因而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更使王弼成为我国易学研究中的重要人物”^④。相较于王弼义理易学的盛行，象数易学逐渐由显转隐，退出了官方学术系统，在民间与道教中依然流传不绝。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⑤正是在这一时期，易学也进入全面兴盛的时代，在象数与义理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就北宋的象数易学来说，出现了专门的《河图》、《洛书》之学，超越既有的卦爻象数形式，向上追究圣人画卦之所以然，这方面以刘牧为代表；创造出次序严整的先天象数学，推究天地阴阳变化之本然，为经传之象数学提供理论基础，这方面以邵雍为代表；汉易中的“卦气说”、“卦变说”以及各种

①（魏）王弼：《王弼集校释·周易略例》，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②（清）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自序》，《黄宗羲全集》第9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③（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④刘大钧：《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76页。

⑤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象数义例也都在新的象数观念下得到了转换和发展,这方面以李之才、李溉等人为代表。“图书”之学和先天象数学一方面是对汉易象数学观念的超越,另一方面也是汉易象数学深入发展的结果,二者在汉易之外创造出易学象数学的新样态,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象数学创造发展的同时,北宋义理易学作为当时易学的主流话语,也是硕果累累。中唐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随着北宋统一的政治文化体的稳固,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这种儒学复兴运动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排斥佛老,承接道统,站在理论的高度来论证儒家的仁义礼乐的文化理想,建立一个取代佛老特别是佛教的新儒家哲学,另一方面在于力图从这种哲学中引申出一套经世之学和心性之学,以配合当时的改革事业,培养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当时具有不同倾向的思想家围绕着明体达用进行探索,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周易》作为主要的经典依据,易学的繁荣就是由于这种具体的历史动因而促成的。”^①可以说,深入挖掘儒家在天道性命上的义理内涵,并将之贯彻到政治文化的实践中去乃是北宋义理易学的主题,也是当时理学的主题。就理学的发展来说,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到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无一不是以《易》为其主要哲学资源建构起各自的学说系统。之所以《易》成为理学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就在于易学所具有的以太极阴阳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系统,乃是建构完善的天道性命的学说的基础。韩愈、李翱选择《大学》、《中庸》的价值观和心性论来与佛教抗衡,固然是远见卓识,但二者并不具有充足的宇宙本体论的形上学支撑,为完善的新儒学理论系统奠基并创立其规模的任务必须要由《易》来完成。现略述北宋五子易学如下: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以太极阴阳的宇宙论为基础,会通《易》与《中庸》,以太极而立人极,提出“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②,建构起理学中第一个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学说系统。张载之学也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③,他以气为核心建构形上学系统,发挥易学阴阳对待、有

① 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②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通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页。

③ (元)脱脱:《宋史·道学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24页。

无显隐的思想：“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①邵雍的思想一则是以太极生阴阳的“加一倍法”创立了先天象数学，揭出“画前有易”的命题，深化了易学象数学的理论内涵；二则是以先天象数学为基础，发挥阴阳、刚柔、动静交互相生的思想，构造了一套涵纳万物生化和历史兴替的宇宙历史图式。程颢的思想混沦超迈，将大易生生之道与孔孟仁说融释为一，开显出仁与天理通而为一的易学新精神。^②程颐的《伊川易传》是继王弼以后义理易学的又一杰作，《四库全书总目》云：“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儒理。”^③自胡瑗开始以《易》辟佛老，而到了程颐这里才完成了以《易》注的形式阐发体用完备的儒家天道性命之学的任务，虽然《伊川易传》在诠释路数上是对王弼易学的延续，但在义理内涵上则完全扬弃了老庄之说而纯说儒理。程颐将其毕生的思想都灌注在他的《易》注之中，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④的命题，成为宋明理学最基本的学理准则。

可以看出，北宋五子的易学创作方式多样，周敦颐立足于太极图之象学，邵雍则立足先天象数学，二人之学都导源于易学象数学；张载虽然有《横渠易说》，但阐释其易学思想的最佳作品则是《正蒙》；程颢本人无专著，表现其思想的主要是语录和书信；程颐则用几十年的精力创作专门的《易》注。这种易学创作方式的多样化，表明当时对《易》的理解不再局限于《易》的文本，更多的是透过文本而直指易道本身，使之为我所用。“周茂叔谓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卦可了。”^⑤张载说：“易乃是性与天道。”^⑥二程也说：“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部书，是易之道也。……即事尽天理便是易。”^⑦以至于邵雍、二

① (宋)张载：《张载集·正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页。

② 参见王新春：《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程颢易学》，《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

③ (清)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页。

④ (宋)程颐：《周易程氏传》，《二程集》第2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9页。

⑤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程集》第1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08页。

⑥ (宋)张载：《张载集·横渠易说》，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43页。

⑦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二程集》第1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页。

程都能提出“孟子可谓善用《易》者”^①、“由孟子可以观《易》”^②这样匪夷所思而又颇有洞见的观点。这种对易道的领悟,为易学与“四书”之间的互相诠释开辟了道路,理学也正是在《易》与“四书”的义理融释中形成和发展。韦政通先生说:“北宋理学家思想的背景及其演变的线索,是由《易传》、《中庸》,逐步逼近《论》、《孟》,自二程提出《大学》开示学者后,《论》、《孟》、《学》、《庸》已并重,而“四书”正式结集、注释,并对其价值分别予以评估的是朱熹,这是学术的工作,也是哲学的工作,这一工作使北宋诸子学的精神与汉儒的经学精神冶于一炉。”^③韦先生所论甚是。金春峰先生也提出:“所谓新儒学,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新哲学。新哲学在开始时期是新《易》学,然后是《四书》学。”^④换言之,经过北宋诸子的创造与发展,易学为理学的形上学奠基并创建其思想规模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到了朱熹那里,已经不必再像北宋理学家那样去由《易》而论理,他只需将周敦颐、二程以及张载、邵雍的易学吸收进来加以整合提炼就能够建起形上学的系统。具体来讲,朱熹的理气说就是通过诠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程颐对阴阳与道的分判而来,并在邵雍的先天象数学中找到了理气关系的最佳衍生范式。可以说,朱熹“四书”学的形成是以《易》的诠释为历史前提的,其“四书”学乃是融释易理于其中的“四书”学。归根结底,从经典诠释学的视野看,朱熹的理学系统也是以易学为根基的,其核心观念就是太极阴阳的义理架构。此太极阴阳的义理架构贯穿朱熹易学与理学的始终,太极阴阳是理气观的范型,是心性论的范型,也是修养工夫的理论依据。太极阴阳之道,正是本书所欲展开论述的贯穿朱熹易学的核心问题。

朱熹自童蒙时期习《易》,19岁以治《易》登进士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仍然探研易理不辍,可以说《易》伴随了朱熹学术生命的始终。作为一个经学家和哲学家,朱熹以其宏大的气魄将之前的整个易学发展尽皆吐纳于胸中,

① (宋)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下》卷十二下,《道藏》第23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49页。

②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第三,《二程集》第1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6页。

③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819页。

④ 金春峰:《宋明理学若干特性的再认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

上文所述从卜筮到北宋诸子的易学发展史,既是朱熹易学的历史背景,也是朱熹易学所一一省思的问题。面对当时易学界象数义理两派分立的态势,朱熹既不是直接依从于其中一家,也不是顺两派之理路而加以整合,在他看来,两派易学都走入了误区,执着于象数的探求和义理的推衍都是不恰当的,要想从两派的误区中超拔出来,就必须越过二者,直接追寻到《易》的源头上,考察其本来的面貌,正源方能清流。于是,朱熹以其独立自由的理性精神,穿透蒙在神圣典籍上的层层迷雾,提出了“《易》本卜筮之书”的观点。虽然这一看法早已有之,但在朱熹的阐述中,此说却饱含深意。他认为只有将《易》看作卜筮之书,回到《易》的原初语境,才能恢复《易》的活力,才能人人可用,才能切实地指导每一个人的现世人生。在此观念之下,朱熹对《易》的文本特质提出了他最富创见的一系列看法,认为“辞因依于象”、“《易》是个空的物事”、“有是理必有是辞”等,发千古所未发。而且在朱熹对占筮的信仰下,将占筮活动与人生应然之价值相联系,认为占筮乃是在趋利避害中使人获得一个正确的价值归趋,是对人生价值的践履和落实,如此占筮亦被纳入其理学的修身正德的视野之中。

顺着“《易》乃卜筮之书”的看法,朱熹对《易》的发展史提出了深具历史理性和诠释学精神的“三圣易”说,主张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分开来看,三圣作《易》的用心不同,伏羲、文王是以卜筮为教,孔子是以义理为教。此说较之《汉书·艺文志》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更为深刻,并对三圣之易的嬗变从学理上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朱熹既看到了“三圣易”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又明确分判了其间意义的差异,三者“不同于法而同于道”,是圣人因时设教的结果,彼此呈现为“理一分殊”式的关系。朱熹在此论述中所表现出的诠释学精神,不仅是其易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而且从中可以照见其基本的学术精神和理论立场,这种学术精神和理论立场在朱熹其他经典的研究中包括其理学思想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

正是在这种历史理性和诠释学精神下,朱熹创作了《周易本义》,恢复《周易》经传之本来面貌,在蔡元定的协助下完成了《易学启蒙》。朱熹虽然推崇二程,但是在易学上他却并没有走程颐的老路,认为《伊川易传》所说义理句句妥当,无一毫欠缺,但却是用《易》来解说程颐的思想,并不是解《易》,认为必须先明确《易》的卜筮之用后才可以推说义理。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以象

数为根本,易辞根源于易象,而卜筮则为《易》的实际用处,其象数既包括当初伏羲画卦所依据的先天象数学,也包括文王以及孔子所发明的后天象数学,而汉易象数学则多非《易》象数之本然。而义理则又分两层:一是伏羲画卦所本的太极阴阳之道,这是第一序的义理;二是《易传》以及后世《易》说从卦爻辞中推演出的义理,这是第二序的义理。而第二序的义理说到底也本之于太极阴阳之道,乃是太极阴阳之道的具体呈现。

在朱熹看来,易学之整体无论是其卜筮本身,还是推说义理、探究象数,包括“图书”之学,说到底都是天命之流行,都是太极阴阳之道的具体展现和实现。朱熹理学系统以理一分殊为最高旨趣,我们必须看到,正是在理一分殊的视野下,朱熹可以将周、张、程、邵的各家学说都融会贯通到他的理学系统和易学系统中来。其之所以对邵雍的先天学推崇备至,对《河图》、《洛书》之学深入探究,就是因为在在他看来,先天学、“图书”之学乃是理之自然,非人为所造,都是阴阳对待流行之呈现。最终,朱熹将其易学都统摄到太极阴阳的义理架构中来。

这是朱熹易学的基本理路,此理路既追根究底,又纵横互通,所思所论皆别开生面,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对先秦汉唐以及宋代易学进行了全盘性的反思,在正源清流的基础上作出了整合性创造,揭示了《易》的本来面貌,疏清了象数与义理的原初关系,深化了象数学的义理内涵,阐明了天道性命相贯通下的太极阴阳之道,构建起一个广大而精微的易学系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而这一系统中又贯穿着朱熹理学的致思方式和价值追求,最终其易学与理学合汇于太极阴阳的义理架构,其易学中有理学之思,其理学中有易学之蕴,二者融会互通。朱熹的易学思想称得上集汉宋易学之大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是易学研究和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下大功夫去做。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意在深入探讨朱熹易学的思想系统,从朱熹易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入手,顺其思想脉络,层层揭示和阐发其中一系列的卓绝创见,既考见朱熹易学之所然,又探究其所以然,特别是突出其背后的哲学文化意蕴,并在把握朱熹易学各个部分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发掘其中的核心问题和基本观念,由此再进入到朱熹易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中,揭示出朱熹天道性命相贯通下易与理的融释互动。

流传下来的朱熹易学史料,主要包括《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易》(《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及其他相关部分、《晦庵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中的论《易》书信和文章,以及朱熹之孙朱鑑根据语类和文集而汇编成的《文公易说》,另外还包括朱熹的《太极图说解》和《通书注》。由于《周易本义》成书过程较为复杂,研究中我们首先是对《文集》、《语类》中的《易》说进行整理,考见其各自年代,然后再以之厘清《周易本义》的成书过程以及具体《易》说的前后变化,在此过程中,完成对朱熹各种论《易》文字的会通研读,寻绎出其内在脉络和理论关怀所在。

而对于朱熹易学脉络的疏理,劳思光先生的“基源问题研究法”较为合理而有效。“所谓‘基源问题研究法’,是以逻辑意义的理论还原为始点,而以史学考证工作为助力,以统摄个别哲学活动于一定设准之下为归宿。”^①正如韦政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用此方法去处理几千年的哲学史,它的限制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用之研究某一家的哲学则非常有效,这不是什么新方法,凡是探讨专家哲学的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会用到这个方法,至于效果如何,这已不是方法本身的问题。^②

本书在写作上即是由朱熹的“《易》乃卜筮之书”这一基源问题立论,在经典诠释学的视野下,上下推展,向上为太极阴阳的义理架构,向下则为“三圣易”说和象数之学。卜筮之书是《易》的本来面貌,其所以然之理即是太极阴阳之道;“三圣易”说是由卜筮渐次发展而来,是太极阴阳之道的不同展现;象数则是卜筮之书的根本表达方式,也是太极阴阳义理架构的符号化表诠,最终贯穿朱熹易学系统的最高“设准”就是太极阴阳的义理架构。以此本书就朱熹易学本身的学理脉络而开展论述,并将其中的各个方面都收摄到一个核心观念上来,力求展现朱熹易学的系统性及其中的丰富内涵。

①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第一章 朱熹早年所受《易》教及其思想的转变

经过北宋诸子的创造与发展,宋代新儒学亦即理学的哲学文化系统已经初步挺立,周、张、程、邵各具规模,各有特色。而到了朱熹这里,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和儒者,他肩荷着两大历史性任务:一方面需要会通整合北宋诸子之说,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学说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实现理学思想与儒家经典义理的契应,既要以经典义理来证成理学的天道性命之说,又要以理学思想诠释出经典在新的历史境遇中的意义,使经学与理学融为一体,只有这样理学作为新儒学才能真正确立。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二而一的,朱熹在理学上研精覃思的过程,就是其沉潜反复于经典义理的过程。如众所知,朱熹一生都在致力于四书的整理与注释,而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所说,朱熹对四书的诠释实际上是以对易理的诠释为基础的,朱熹毕生也都在进行易理和《易》文本的诠释工作。了解朱熹习《易》、研《易》的学思历程,是开展朱熹易学思想研究的前提,故而我们这里先对朱熹早年所受《易》教及其思想的转变问题作一考察,以从中考见朱熹后来一系列易学思想的师承渊源,时间自朱熹 15 岁从学武夷三先生起,到 35 岁写成《杂学辨》为止,此后朱熹开始提出自己独特的易学见解,我们则于相关章节随文而论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宋高宗建炎四年,生于福建尤溪。其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从学于杨时(1044—1130)弟子罗从彦(1072—1135),与李侗为同门之友,“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①。朱松为少年朱熹提供了一个良

^① 朱熹:《皇考朱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97,《朱子全书》第 2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506—4507 页。